



■ 本报记者 李红阳 杨颖

在专利领域享有盛名的英国《知识产权管理》杂志组织的中国境内一级专利、商标代理事务所评选中,有一家代理机构常年上榜,这就是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专利公司)。它是国内最早的三家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之一,于1984年中国专利制度施行之初在香港成立,今年恰好迎来她的30周年华诞。就在不久前,从美国纽约再度传来佳讯——6月19日,在国际法律联盟高峰论坛及颁奖大会上,香港专利公司在被提名的10家中国最知名知识产权事务所中脱颖而出,继去年获奖后,再度蝉联2014年中国最佳知识产权事务所大奖。

“今年,国际法律联盟高峰论坛及颁奖大会邀请了400多位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公司和事务所的律师及法律主管参加,相关奖项由全球客户提名,业内专家打分评出,其公正性和权威性为知识产权界普遍认可。”香港专利公司总经理曾祥麦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获得这个奖项是对港专人多年来努力工作的回报,也是对香港专利公司诚信服务和严格质量管理的肯定和赞誉。前任总经理李勇曾说过,公司的巨大成功可以用老子的一句话来诠释: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30年讲诚信重质量

香港专利公司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为主要出资人,于1984年在香港成立。彼时,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刚刚起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还处于草创阶段,中国贸促会依托香港的特殊环境设立专利公司,对于积累更多国外客户、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都有积极意义。

“香港是个窗口,它的法律比较完善,更接近于西方社会。当时的外国企业也更愿意借道香港进入中国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几个创始人开始了早期的探索。在中国贸促会的领导下,香港专利公司始终在香港和内地法律的双重规范下依法运营,不忘创立之初即设定的‘诚信、优质、高效’的经营方针,并逐步改革和发展,后来在北京、深圳、上海、纽约、东京、慕尼黑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据曾祥麦介绍,在早期,香港专利公司的涉外专利代理业务起点较高,具有垄断性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1993年起国家开始逐步放宽涉外专利代理权,到了2009年,该领域的垄断局面更是被完全打破,任何一家在中国合法注册的专利事务所均可以办理涉外专利代理业务。

然而,直到2009年,香港专利公司仍然未完成自身调整。这导致客户对公司服务质量的抱怨时有发生,有一些客户因此流失。曾祥麦说,“2009年公司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为了使公司在竞争环境下继续生存和发展,公司紧紧围绕‘质量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一关键,不断改革完善包括质量管控体系在内的经营管理机制,对内秉持以人为本的方针,对外坚守客户至上的理念,讲诚信、重质量,通过建立和有效运行涉及业务、人事、财务等诸多方面的现代企业制度,顺利完成了从垄断经营到市场竞争的转变,不仅公司利润逐年有了明显增长,更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的大型知识产权事务所。”

优质服务吸引高端客户

除公司上述传统业务(专利申请、代理业务)外,在采访过程中,曾祥麦还谈起了香港专利公司办理的一起E公司系列专利无效案。据介绍,这是该公司有史以来遭遇的极具典型意义的专利攻防大战,涉案的E、H公司都是全球非常有影响力的企业。面对棘手的案件,正值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的香港专利公司迎难而上,顶住了初期出师不利等重重压力,全面统筹应对方法,投入了很多优质的技术与法律力量。通过不断地抽丝剥茧,在充分了解、分析了案件情况以及可能涉及的技术、法律、

程序等各种因素后,局势逐渐扭转,历时3年该案件最终于2011年下半年以E公司和H公司的和解画上句号。这个系列案的成功为公司业务从传统领域向高端领域转变和升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多年来的专业服务为香港专利公司赢取到了很多国外高端客户。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对获取涉外法律专业机构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多,香港专利公司的国内优质客户也越来越多。曾祥麦特别提到,对于国内的高端客户,尽管目前他们能够接受的服务价格仍远低于国外客户,但香港专利公司一如既往地为客户提供与国外客户标准完全一致的优质服务。该公司专门为国内客户独立建立和开发了“向中国国内申请”和“向国外申请”专利代理合同的标准化及规范化管理制度和电脑系统。下一步,他们拟继续将该系统的功能扩展至国内客户财务管理和业务流程管理上,为高质量、规模化地服务于中国企业奠定基础。

优质的服务源于内部完善的规章制度。曾祥麦说到自己上任伊始,就面临着如何改革公司的专利业务管理制度和运作模式的问题。如何使公司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避免被淘汰出局?如何提振员工信心、化解内部矛盾、加强企业凝聚力?曾祥麦认为,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建立一个全面的服务质量管理控制机制。为此,香港专利公司建立并完善了一系列涉及业务、人事、财务等诸多方面的现代企业制度。例如,科学高效的计算机辅助管理制度、统一规范的新员工培训和上岗考核制度、代理人负责及人性化奖惩制度、针对重要客户建立的分组办案制度、客户小组长责任管理制度、部门经理事前全面核查制度、质检组事后抽查制度和抽查结果公示制度、定期公示优秀代理人案例的通报制度、国内专利代理合同的标准化及规范化管理和审批制度、疑难案件协同配合处理制度等等。完善的专利代理和内部管理制度,成为吸引国内外高端客户选择香港专利公司的一张王牌。

采访中,曾祥麦也谈到,近年来,中国的知识产权数量虽然逐年攀升,但质量还有待提高。尤其是在企业内部的知识产权管理上,国内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去年,我去欧洲访问的时候有一个做烟草机的德国企业委托我们做一些专利方面的翻译工作。在洽谈业

务的过程中,这家德国公司提及,他们已检索到中国相关专利近千件,但真正可能对其构成威胁的只有40多件。中国专利技术的量多质次由此可见一斑。”曾祥麦说,“如今,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已经做得非常细致。国内企业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这不仅会减少垃圾专利的产生,还可能为企业节省很多不必要的开支。而在‘走出去’之前,国内企业也要进行充分调研,看看是否存在专利覆盖的情况,能否自由实施;另外,企业还要做好专利布局,提前进行专利申请,这也便于未来与其他企业谈判,进行交叉专利许可等。”

深化改革促进可持续发展

“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大中型或外向型企业和科研机构等,特别是以创新驱动发展作为企业战略的、真正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企业。”曾祥麦说。

现在香港专利公司也面临着国内外所有知识产权代理机构都会遇到的“利益冲突”问题,即公司越来越难以同时为存在商业竞争关系的客户双方提供知识产权服务,客户要求不得代理其商业竞争对手业务的情形越来越多。这样一来,香港专利公司继续大规模扩展专利申请业务量的空间已极其有限。如何继续保持香港专利公司在专利代理界的“龙头老大”地位、进一步提高经营业绩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对此,曾祥麦表示,香港专利公司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深化改革:一是

在传统业务领域(专利申请的代理)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争取服务定价和价格谈判的主动权,确保利润合理化和最大化以继续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多年来,香港专利公司的优质专业服务,赢得了一批优质客户,他们在认可公司服务质量的同时也认可“物有所值”的服务价格,从而达到双赢的良好效果。二是扩展和延伸新型高端服务业务,培育知识产权服务的新的业务增长点。新型高端服务业务包括知识产权确权 and 维权诉讼、专利申请等法律文件的英文(外文)撰写、企业知识产权预警反馈、风险分析及尽职调查报告、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制定、专利地图及专利导航运用、国内客户海外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等等。香港专利公司要确保可持续发展,继续在业界担当“领头羊”角色,必须高瞻远瞩,棋先一着,向这些高端业务领域大力扩展和延伸。三是打造精英代理人团队,既要给他们提供充分发挥其业务能力的舞台,也要创造充分展示其才能的机会。一支德才兼备的优秀代理人队伍,是保障香港专利公司知识产权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今后,香港专利公司将一如既往地秉承‘服务四海,诚信天下’的理念,竭诚为中外客户提供优质、高效、全方位的服务,也将继续承担作为贸促会驻港机构和现代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作为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国家队’,香港专利公司将在配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和助力中国高端企业‘走出去’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曾祥麦说。



香港专利公司(CPA)员工喜迎公司成立30周年

从Vringo商战看“专利流氓”的去标签化

■ 刘晓春

专利经营公司Vringo的商战经历,用眼下走红的首部关于中国企业专利商战的小说名称“专利凶猛”来描述,是再恰当不过了。近日,媒体争相报道说,Vringo刚刚输了对谷歌的二审官司,导致股价暴跌70%。而在这场败仗之前,Vringo已经取得了很多辉煌战绩。Vringo公司运用手里的专利组合,针对许多高新技术公司发起专利诉讼,因而也不可避免地被贴上“专利流氓(Patent Troll)”的标签。

Vringo跟谷歌之间本打的是一场持久战。早在2012年,Vringo就在针对谷歌“AdWords”的专利官司中取得胜利,陪审团十分慷慨地判赔3000万美元,被媒体称为是“专利流氓”赢取的最大胜仗之一。而且,2013年,法院要求谷歌为使用Vringo的专利而支付AdWords销售业务收入的1.36%,也就是每年高达2亿美元的专利使用费。这些专利带来的巨额财富前景,刺激Vringo股价快速飙升,也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推动了对“专利流氓”现象的讨论和反思。随后,Vringo又在2013年1月起诉微软的必应(Bing)搜索引擎,微软迅速与其和解,答应支付100万美元外加与谷歌诉讼最终判赔金额的5%。不过,随着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二审中宣布Vringo的专利无效,这5%的判赔最终不了了之。

专利战中的起落伴随着股票市场的确

烟,勾勒出新生代专利经营公司的商战轨迹。这些专利经营公司的基本特征是自己不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不真正实施专利,其经营模式的核心就是运用其专利组合,通过诉讼等方式来获取赔偿金或者和解费。它们被称为“非专利实施主体(NPE)”、“专利主张主体(PAE)”,但是深受专利诉讼困扰的企业更愿意用带有感情色彩的“专利流氓”来称呼它们。“专利流氓”这个称呼,已经如同当年的“知识产权霸权主义”等词语一般,用一种先入为主的标签化提法,抽离了许多复杂、细致的信息,将某一类主体和现象简单化、平面化,一旦一家企业被归类为“专利流氓”,便似乎已经处于道德上的劣势,其行为和获利便失去了正当性。

对于专利经营公司,一旦放下理性的观察态度,而一味用简单化的标签来赋予先天的成见,那么事情恐怕就会变得不妙。专利经营公司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无外乎因为许多NPE公司轻率、恶意发动诉讼,并企图从中谋取暴利,这种利用专利投机的行为,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过经营、运作专利资产来盈利的模式本身就是十恶不赦的,那些从事实业生产、服务的企业,也并不会天然就具备道德上的优势。事实上,Vringo手中的专利,也是购自有实体经营的公司,比如,Vringo用来针对谷歌的两个搜索引擎相关的专利,是购自搜索引擎界的元老Lycos。而Vringo早先针对三星、中兴等公司提起的专利诉讼,据报道涉诉专利是来

自老牌手机巨头诺基亚。有意思的是,随着诺基亚去年将手机业务出售给微软,业界不少人开始担心,手握大量无线通信技术标准必要专利的诺基亚,会不会华丽转身为通信界最大的“专利流氓”。

从制度上来说,比随意给一类主体贴上标签更有建设性的做法是,通过制度建设和规则构建,更加有效地阻止权利人从投机行为中获利,增加其投机行为的成本。比如,要求原告缴纳诉讼保证金,败诉时承担被告的诉讼费用,要求权利人发送的侵权警告信函包含更加具体、准确的信息等等,都可以使得原告在发动诉讼时三思而行。此外,直接影响到Vringo案件二审判决的美国最高法院近期判决Alice v. CLS Bank一案也被视为是一种阻止专利投机行为的努力,该案提高了软件专利的授权标准,直接导致了Vringo的两项风光无限的搜索引擎技术专利在二审中被判无效。凡此种种,都是专利制度和诉讼制度内生的可以用来防止投机行为的资源和规则。从政策上来说,与其把经营专利为主业的公司都不加区分地贴上“专利流氓”的标签,不如更加理性地观察市场主体的行为,区分哪些是浪费社会资源的投机行为,哪些是正当的维护创新的努力,然后选择合适的对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

专家评法

法律干线

全球法人机构识别编码国内注册系统建成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18日宣布,全球法人机构识别编码(LEI)国内注册系统已建成运行并开展服务。

记者从央行了解到,国际金融危机后,为构建国际统一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全球范围内系统性金融风险识别能力,金融稳定理事会于2011年7月动议构建全球LEI体系,为参与国际金融交易的机构分配唯一编码以便识别交易对手,加强全球参与金融交易机构的信息管理,并于2012年6月开始着手筹建这一体系。

童鞋六价格超标 中国鞋输欧面临重金属大考

本报讯 近期,欧盟非食品类快速预警系统(RAPEX)对中国产的出口法国和西班牙的4款童鞋发出消费者警告,警告原因都是因为童鞋中所含六价格超标,其中一款童鞋超标高达100ppm,是法国、西班牙等国家对六价格规定最高限量3ppm的33倍,以上4款童鞋都已被限令强制撤出市场。

业内人士表示,制鞋出口企业应该及时关注不同进口国对六价格限量的差异性要求,特别是德国、

央行建成的全球LEI体系国内注册系统网址为<http://www.leichina.org>,将提供全球LEI编码注册、编码年检、数据更新、编码迁入、质疑与反馈、数据查询与数据下载等服务,受理全球LEI编码申请,可满足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交易的机构对全球LEI编码的各类需求。

目前,美国、英国、德国等欧美国家已相继组建全球LEI体系本地系统,印度、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也正在积极推进本国LEI编码注册和数据管理工作。(刘铮 王培伟)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要求较高,限量为3ppm。同时,出口企业要把控源头,加强供应商管理,不随意从非合格供应方处采购原辅料,明确质量保证条款,对制革所用的铬粉进行六价格检测。此外,制鞋企业应该控制生产过程,调整制革工艺,比如使用植物复鞣剂、使用还原性的中和试剂和复鞣剂、皮革加脂时将抗氧化剂当作加脂助剂等,确保生产过程中不产生过量的六价格。(尹国尚)